

# 前沿

The Frontier



Vol.06, 2014.09  
CFAUMUNA Presents

# 前沿

The Frontier

2014年09月 总第06期

Vol. 06 September 2014

总主编： 吴梦羽

责任编辑： 牛健合

陈思婧

策划： 许卫赫曦

设计： 吴怡敏

顾问： 黄启凡

官方网站：<http://i.cfaumun.org>

特别感谢所有参加杂志投稿、制作的作者和编辑人员。

本刊为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内部刊物，立场中立，所有文章仅为作者态度，均不代表本刊观点。

投稿及一般性问题咨询，请联系 [frontier@cfaumun.org](mailto:frontier@cfaumun.org)

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 荣誉出品

## 梦想开始的地方

时光很快：回头一看，距离我第一次参加模拟联合国，已经有六个多年头了。六年的路一步一步走来，我对模联的理解也在不断地改变。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学校内联合国大会特别委员会代表印度尼西亚，讨论科索沃问题。那时，模联对我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许多我崇拜的学长学姐在模联，所以那里一定是个非常优秀的地方。我希望自己也能变得优秀，所以我一定要加入模联。

到了高中，开过了几次校内模联，却越来越不了解模联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学术？的确，开完会，我对于我们讨论的问题的理解的确能够加深不少；人脉？好像也是认识了很多以前只闻其名的大神；领导能力？的确好像自信了不少，不过，自信和领导能力有关系么？可是以上种种，却总觉得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我不知道我坚持的是什么，为什么还是一次又一次投入到这个活动中去。

直到那一年的北京模拟联合国大会。外交学院的那次会议，是带给我最多收获的一次会议。记得那年报名之前，我们的指导老师告诉我，外交学院的会议是全中国最学术的会议。果然，BMUN真的不负我所望：浓厚的学术氛围，详尽的细节思想，都是我闻所未闻的。那一次的会议，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前辈们曾经向我描述过他们在参加模拟联合国过程中的感觉。也正是在那一次的会议上，我坚定了自己选择外交学院的信念，也正式决定在模联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那次会议教会我，模联决不是比赛；参与会议，决不是要比比你和我谁的英语更优秀，而是要设身处地，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外交官，真正地代表自己国家和自己国家集团的利益，在全场为了合作而合作的呼声中坚持自己的立场，哪怕这一张否决票会让整个会议都没有最终的结果。模联要做到的，是帮助我们成为更加优秀的自己。

对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终其一生我们都不会真实的坐在我们曾经在模联所坐的那个位置上，做出改变世界命运的决定。但正如我们一直所说的那样，政治与人生有着很强的类似性。我们或许不会掌握核武器，却掌握自己的命运，或许也正在改变着那些每年初夏从五湖四海前来北京，参加北京模拟联合国大会，追求更好的自己的人们的命运。

走到今天，模联已不再能为我带来什么了，但我依然拥有为这项事业奋斗的勇气：我想要把自己当年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告诉所有来参加会议的代表，让他们也能体验我当年体验过的喜悦和激情。每次给代表开会前，无论是在BMUN还是在其他会议，我都会告诉自己：可能这次会议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它却有可能像当年那样，改变一些人，让他们有动力成为更加优秀的自己。

没有模联，我的人生一定不会是这样子。我深知自己多么幸运。如果不是当年的那次参与会议的机会，我的生活绝对不会如此多彩。因此，我在 BMUN 中的所有投入，都是为了回报那一次机会，都是为了让更多人得到那样一次机会。

今天，当年的少年已成为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会长，带领着四十余位协会成员共同前进。这本杂志，也将作为我们共同开创新的目标的见证者，记录协会成长过程中的点滴。我衷心地希望各位读者能够与《前沿 The Frontier》一道，在接下来的时光中共同进步，变得更加优秀。

黄启凡  
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 会长  
2014 年 9 月 25 日

# 目录

日本文化产品中的日本	北外模联协会	1
Peaceful Rise out of Deng's Diplomacy	Nan Zhou	4
关于中美汇率博弈的一点思考	常蔚青	10
未来五年（2014—2019）中国的国际机遇与挑战	乔澍	12
谈一谈模联	廉雅雯	17
国际组织与中国国家能力建设	叶爽	19

# 日本文化产品中的日本

北外模联协会

早在 2007 年，曾有这样一条新闻让我大惑不解：“时代周刊各国形象调查，日本居世界第一”

美国时代周刊 27 日发布了一项由来自 27 个国家的 3 万名受访者对世界 12 个主要国家国际形象打分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日本国际形象高居世界第一，中国排第五……

在当时的这篇环球时报的报道中，编者的评论主要集中在赞扬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然而对于从普通媒体渠道获得对外国印象的我来说，这个消息冲击了我对于日本的认识。在一个普通中国人眼中贴着“拒不认错，右翼抬头，修改历史”标签的日本，同那个国际形象世界第一的日本两个形象之间距离，当时让年纪尚幼的我迷茫不已。时至今日我已长大少许，也接触到了更多的日本文化产品，迷茫多少仍在，但幸赖数年所学终究能从迷雾中窥得一二真实，曾经困扰我的谜团，只是日本公共外交政策效果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公共外交是一国通过对国外公众施加影响促进本国利益的行为，作为新的学术热点在近年来受到着越来越多的关注。日本作为当今世界国际形象最好的国家之一，其公共外交政策自然也成了无数学者争先恐后研究和分析的对象。本文暂从日本的文化产品切入，从自身观察得来的直观资料和感受配合学过的粗浅理论进行分析，到底日本文化产品中包含了怎样的日本文化元素，又在对外形象的建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 一、责任与自律

日本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通篇都在强调着“耻”感文化作为日本文化核心对整个日本社会产生着的巨大影响。显然这种影响也在日本生产的文化产品中体现了出来。“耻”感文化下的人们极端依赖社会对自己的评价，因此强迫症一般的想方设法不为社会中的其他人添麻烦以免自己蒙羞，另一方面一旦下定决心改变立场，又会彻彻底底的改变全部的行为准则，这是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这一特征的原本表述。这种文化特征造就了日本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的极度的自律和责任感，也在日剧、小说、电影、动漫画中大量表现了出来，而其消极一面的嬗变和缺乏个性则由于文化作品题材和内容天然的特点被掩盖了。文化产品一般围绕有趣的故事为核心，主人公一般性格充满特点且意志坚定，且日本的文化产品以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为主，因此更容易体现出“耻”感文化所带来的强责任感和自律的特点。

诸如“不能给他人添麻烦啊”，“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之类的台词配合上从汤川学到半泽直树的一系列身为普通人的荧屏或书本英雄，塑造了对于日本人有责任心守规矩且非常自律的印象。这种印象配合上日本世界排名第二的对外援助和对国际行动的积极参与很容易就能增加海外观众对日本的好感和信任，从而树立了日本值得依赖的国际形象。

## 二、各司其职，各安其位

日本文化的另一大特征就是强烈的等级意识，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当代日本人早已不会在如同过去一般严守着从天皇到平民的等级秩序，人人平等作为政治概念也早已深入人心。但是上千年等级制度安排留下的惯性仍然在日本转动着。无论是在工资制度上独特的年功序列制还是在饮宴时的复杂礼仪都是其表现，这种等级意识在今日最大的留存就是日本人的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的思想。表现为对不是自己工作范围的事（比如政治）的漠不关心，对专家精英的盲目信任，和缺乏野心这三个方面。表现在文化产品中则更为有趣。如果说中国文化产品中的英雄是那个出身微贱寒窗苦读多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凭借自身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人；美国文化产品中的英雄是那个受到陷害或压迫但仍坚持自己的正义拯救了整个社区 / 国家 / 地球的孤胆英雄；日本文化产品中的英雄就是那个继承了父亲面包店后立志要烤出吃了之后能让人感到幸福的面包的普通邻家大哥哥。

长大的梦想是继承父亲的拉面店这种对于日本文化产品来说司空见惯的场景对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而言显得多少有些新奇。至少在中美的作品中很少见到有如此“胸无大志”的主角，更不用说这样的主角还能得到女主角的芳心了。这种新奇的剧情配合上日式的音乐和镜头风格或者文学样式，带来的就是一种对日本人的安分守己与世无争和谐没有野心的印象。相比于中式的上进故事和美式的英雄主义，日本的故事给人一种更强的安全感和更小的威胁，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日本尽管一直追求着世界舞台上更高政治地位和重新武装，却仍然没有激起国际社会普通民众普遍的对其目标的怀疑和恐惧的原因之一。观众们很难把国际舞台上那个锐意进取的日本和荧幕中那个挂着与世无争微笑的小伙子联系起来，尤其是后者看上去距离她们的日常生活更接近的时候，他们就更愿意相信后者给她们的直观印象。尽管这种印象其实体现的是作为个体的日本人在体系内各安其位与世无争的特点，观众们却会无意地将其放大为作为整体的日本政府在国际体系内的安于现状（没有威胁）。

## 三、物哀

川端康成曾经说过，“物哀是日本美学的源流”。物哀指的是一种见外部之“物”而自身自然涌出的感情，其特点是含蓄，且注重瞬间即逝的感觉，是所有日式文化作品中日本风味的核心来源。下面摘录一首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和歌和一句在日本家喻户晓的话：

花の色は うつりにげりな いたづらに わが身世にふる ながめせしまに

小野小町

“西方人表白时说 I love you, 日本人的话只会说, 今晚月色真美。”

夏目漱石

这首歌的大意是：樱花的颜色在我无意之间就已在雨中褪去，我自身也是，在凝望之间就已在世间老去。作者是日本古代第一美女小野小町，在日本人心目中大概是中国四大美女合一的地位，这被认为是她最美的和歌。其中就渗透了日本物哀美学的鲜明特点，感情抒发的含蓄压抑，与身外事物的充分共鸣，对稍纵即逝的无常美的推崇成分，作用到日本的文化产品中也就形成了以下三个特色：1、人物情感表现含蓄，作品整体情感波动不大。2、极其重视景物的描写和气氛的营造。3、悲剧多。本文将谈及前两点。

情感表达含蓄的特点使得日本的文化产品在进入西方社会时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客观上阻碍了日本文化产品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但是重视景物描写的特点却给日本带来了意外的好处，那就是对旅游业的促进，日本的影视剧作品往往会拍的如同宣传片一般，因此影视作品一旦流行也会迅速为拍摄地带来旅游热潮。比如当年电影《情书》风靡亚洲的时候，北海道的小樽市游客来访量在三年内上涨了一倍，旅游业收入更是从 450 亿日元上升到了 1500 亿日元。这种物哀美学对旅游业的带动的积极效果在亚洲区域内被展现的淋漓尽致，不仅是我身边的同学们看过日本文化产品后都想去日本旅游，实际上根据日本产业经济银行的 2011-13 年的调查，在这三年中日本一直是亚洲人最想旅游的国家。经济上的利益也许在国际政治角度上并不能算是很大的好处，但是作为旅行目的地的文化影响力和良好形象对于公共外交而言也是弥足珍贵的。

文化产品中的日本从真实的日本文化中获得了它独特的魅力，同时又避免了日本文化中嬗变无主见盲从的负面因素，日本文化产品塑造了一个负责任自律做好自己的事同时又毫无野心谦恭安分的日本人形象和风景如画的日本，并借此在全世界的观众心目中埋下了对这样日本的好感。公共外交究其根本，是去除对本国误解造成的幻象和制造对本国有利误会幻象两方面过程的结合。我们也应从日本文化产品对塑造日本国家形象的“幻象”过程中学到经验。这样才能避免在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和伏地魔之争中浪费精力。

\* 本文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模拟联合国协会特别供稿。



# Peaceful Rise out of Deng's Diplomacy

Nan Zhou

**Abstract:** The 21st century has witnessed the birth of a new strategic idea in China's diplomacy – the Peaceful Rise. As the embodiment of collective wisdom, the innovative product featur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s. A peacefu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breeds a rising China, who, with the help of the new concept, endeavors to realize its own socialism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Keywords:** Peaceful Rise,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s,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trategy

**摘要：**和平崛起的战略思维是中国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外交领域的一大创新成果，是新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智慧结晶。对于中国来说，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社会环境是中国崛起的有力保障，有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平崛起的理念是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本文通过分析说明对此加以论证。

**关键词：**和平崛起 邓小平外交思想 和平与发展 国际战略

## Introduc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a's new leaders of the time officially initiated the fresh ideas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namely the Peaceful Rise, which has been developing into the will and mindset of the state. The idea, not without its root, boasts a legacy inheriting from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s, drawing on the traditions while exploding them. The coherence between the two gives expression to the consistency and success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and strategy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

## The Birth of Peaceful Rise

From 1979 to 2004, the past quarter of a century is a twinkling in the galaxy of human

history but of improving significance for China in Eastern Asia who, within the period, rose and caught the eyes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area.

China's rise, on the one hand, derived from its rapid development in economy. In 2003, for example, China's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reached 11.6694 trillion yuan, whose scale of economy has surpassed that of Canada and Italy,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G7. The increase in foreign trade showed that China's global market share had reached more than 4%, becoming the most invested country in the world with a total number of 53 billion dollar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Economic Outlook released by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 September 2003, it was estimated that the top four economies in terms of purchasing power would be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Japan and India.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despite its economic prosperity, laid great emphasis on exerting a positive and responsible rol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report of the 16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PC summarized China's diplomatic development as three aspects: the great power relations, the mult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 Specifically, China would ameliorate the relations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by seeking for common interests to forge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China would enhance the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by implementing reciprocal policy; China would promote its cooperation wit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establish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 characterized by justice and reason. Additionally, China contributed to the Six-Party Talks with its influence and made the most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in tackling the issues of anti-terrorism. China's diplomacy, thanks to the positive performance, was considered more confident, more active, and more comprehensive. Frequently showing up on the stage of regional security, China was widely known as a peaceful riser.

We can find something different, however, when looking into the history. States have risen, fallen or even died since the 15th century, respectively the Netherlands, Spain, France, the Great Britain, Prussia, Russia and Japan. The great power has always risen with conflicts and wars, overturning the existing order to build a new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its own interest. The traditional image that rising bring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turmoil and wars, therefore, leads to the anxiety and doubt on China's fast growing strength. In order to ease the tension, China has made its commitment to the world that a rising China will hinder and threaten no country, and

that China does not seek hegemony and will not when it can.

To better inform the world of China's peaceful rise, the leaders have interpreted the philosophy behind the concept on different occasions. In October 2003, when President Hu Jintao paid his visit to Southeast Asia, peaceful rise was proposed and had its debut. In December 2003, Premier Wen Jiabao mentioned the concept in his speech at Harvard and President Hu reaffirmed the idea in the conference of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Mao Zedong's birthday the same year. In February 2004, the concept was mentioned by President Hu in the 10th collective discussion of the CPC politburo. Peaceful rise was then further illustrated when Premier Wen answered questions in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two sessions (NPC and CPPCC), by the end of which China's new concept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has remarkably impressed the world.

## II

### Peaceful Rise –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s

China's diplomacy is more flexible than foreign policies of any other ideology. To counterbalance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born out of China's development, the leaders then brought about the new concept of Peaceful Rise, which carried on the diplomatic thoughts from Deng Xiaoping.

#### 2.1 Deng's View of the Time Acts as the Foundation of Peaceful Rise

Back to 1980, Deng's version of analysis led him to believe that at a time when both superpowers were armed with the ability of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it is of great possibility that no epic war will be waged in the long run and peace is hopeful". He noted, "The urgent issues now are globally strategic; one is peace and the other is economy or, say, development." It's very significant to connect peace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theme of the moment in that a state fails in decision making on strategy and policy when no proper judgment is made about the direction of the time. Deng Xiaoping, following the logic, asserted that a peaceful environment is needed for China's construction and it's a necessity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well to develop economy. Peace, therefore, is the prerequisite of China's peaceful rise.

With the trend of multi-polar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interdependence and common interest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been greatly enhanced. The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mong great powers became promising and it was likely to spring up some “multi-win” situation under non-zero-sum game. Filled with precious opportunities and benefits, these all contributed to the possible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ar future. Based on Deng’s understanding of the era theme, the leaders of China, integrating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status-quo, created the theory of Peaceful Rise.

## 2.2 Deng’s View of National Interest Acts as the Cornerstone of Peaceful Rise

Deng is the first statesman among the leaders of new China who made it clear that national interest should be the only priority in handling foreign relations for China. He believed that national interest is synthetically unified with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being the most fundamental elements and socialist modernism the most dominating one. Deng described his picture in the talk with the president of Brazil in May 1984. “Our foreign policy aims to maintain peace. Under this premise, China will be wholeheartedly engaged in modernization to bui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ractical flexibility the Chinese diplomacy employed, consequently, was restored for peacekeeping, which, in terms of national interest, provided a sound environment for building socialism. This is the springboard as well as cornerstone for Peaceful Rise.

Peaceful Rise was faced with not only domestically guaranteed interest but also the equivalent from abroad that China should be compatible with the world, which mean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ism is good for the causes of human progress. On the one hand, the state nature decides that China is a socialist country in which people take the leadership and their interests are going for the human social values so that China must be a vital power to maintain world peace.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the globalization tightened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hina and other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like terrorism, transnational crimes and contagious diseases were still creeping. Joint efforts and hard work were direly needed. To sum up, considering Deng’s view of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rational reasoning of the day, Peaceful Rise turns into a requisite.

### 2.3 Deng's View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cts as the Objective of Peaceful Rise

In the late 1980s when the US-Soviet rivalry was trapped in a two-way frustration, Deng posed his claim of forging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overall situation is changing," he said, "All states have been pondering a new policy and thus a new order." Deng believed two tasks should be done simultaneously: to establish new international orders respectively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His proposal accommodates itself to the requirement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UN Charter.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nly by promoting the drive of a new order can we embrace a world economy where states coexist and mutually benefit. Peaceful Rise conforms to the tide and strategically systemizes what Deng has put forth.

### 2.4 Deng's View of Comprehensive Security Acts as the Guarantee of Peaceful Rise

Comprehensive security consists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Deng's view grew out of the era theme and national interest, including the basis, destination and challenges of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along with the strength,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support to fulfill them.

As for traditional security, Deng believed that under the premise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elements like military, geopolitics and ideology still weigh considerably. Therefore, the training of a powerful modernized army was adopted as a highlight in his security theory. Under the reign of national interest, Deng, noticing the historic new tasks of peacekeeping, insisted that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be given prior attention while making full use of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When it comes t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economic instruments are as feasible as armed forces and the economic security, Deng stressed,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China's life and death.

Deng's view on security refines his idea that security rests in development and the latter in return safeguards the former. "The key of China's rise lies in its own strength, the self-reliance on its vast domestic market, sufficient workforce, solid financial

resource and the innovation from reform,” commented Premier Wen Jiabao, “China can’t do without the world. The opening up policy must be carried on where friendly trading ties are forged based on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s.” Deng’s view on comprehensive security, in short, helps to create a stably concrete environment that further ensures China’s rise.

## Conclusion

The strategic idea of Peaceful Rise absorbs the essence of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while staying innovative and making some breakthroughs. Contributing to the world peace and human progress, the theory will serve to alleviate the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s China’s development and prepare a better stage for the rising dragon.

### Bibliography:

1. 人民日报, 第一版, 第三版, 2004/03/15。
2.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3. Goodman, David S.G. Martin Lockett and Gerald Segal. *The China Challenge: Adjustment and Reform*.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6.
4. Ikenberry, G. John.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5. Layne, Christopher. “A House of Cards: American Strategy toward China” *World Policy Journal*, Fall 1997.

\*Nan Zhou is a senior student majoring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He is the Under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Association.

## 关于中美汇率博弈的一点思考

常蔚青

2005年7月21日，中国官方正式宣布实施自1994年以来的第二次汇率改革，人民币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7年5月，央行宣布，人民币对美汇率每日浮动范围扩大到0.5%。近十年来，人民币几乎不断升值，对美汇率从最初的8.3:1的水平降至了2014年不到6.1:1，升值幅度超过了35%。

人民币汇率之争最早始于2002年日本的挑起，这个问题随后在2003年被美国迅速接手。之后的十余年间，美国则一直是促使人民币升值的主力军，从媒体、学者、商界、议员、政府等多方面、多领域、多角度对中国施压，甚至还联合了其他国家共同对中国采取强压。美国方面声称，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处于低位，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造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威胁到美国的生产商和工人，并且阻碍了亚洲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升值，直接或者间接扭曲世界价格，导致世界资源配置不合理与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果人民币不改变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全球经济将面临严峻风险。

当时中国面对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与20年前日本的处境颇为相似。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到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已经证实了美英法施压日元升值非但没有解决美国经济疲软和贸易赤字问题，相反还对日本经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失去的十年”。“广场协议”实质上并非为改善美国经济状况，而是美国打击当时其最大的债权国日本的一种手段。21世纪，中国各方面迅速崛起，自2008年起已代替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国内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严重，美国感觉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受到威胁，企图故技重施，想尽一切办法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阻碍中国发展。在经济方面，美国利用中国经济对外依赖性强这一特点，欲通过施压人民币升值来干扰这个外向型经济体的发展。

在2005年中国正式汇改之后，美国仍继续施压人民币升值。其根本目的在于“攘外安内”。一方面，对人民币施压是美国内部压力外部化的重要举措。对于面临中期选举的奥巴马政府来说，将国内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归咎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把内部压力宣泄到本就具有争议性的中国经济上，是在选举中赢得选票从而能够继续控制国会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能使得中国所持美国国债缩水，避免美国金融行业对中国的依赖不断加深。同时，中国经济尚处于转轨阶段，各项市场制度尚未完备。而人民币升值造成大量国际投机资本即“热钱”涌入中国，冲击中国的证券和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美国由此降低中国对其金融业和经济政治的威胁和影响，巩固其自身国际地位。

从中国成功避免 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冲击，到中国在全球金融海啸中的良好表现，人民币在国际清算体系中逐渐得到了市场的认同和肯定。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未来的中国经济必定会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

反观美国对日本、欧盟乃至崛起中的东盟的制裁，可以说，中美汇率博弈只是中美战略博弈的先锋。2010 年以后，中美汇率间激烈的争端日趋平复，但这并不代表中美之间的博弈结束了。即便如此，我仍相信，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消费国与最大的储蓄国，美国与中国离不开通力合作，世界也离不开中美的协作。“Chimerica”这个新生词汇，便是未来国际趋势的最好写照。

\* 常蔚青是外交学院本科二年级国际经济学院的学生。她是外交学院知行学会的副会长。



# 未来五年（2014—2019） 中国的国际机遇与挑战

乔澍

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崩溃，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暂时呈现“一超多强”局面。伴随国家力量消长，雅尔塔体系的残存影响不断消失，由旧的两极体系向新的国际体系转变的过程不断加快。2008年金融危机后，遭受严重打击的美国国际影响力大不如前，制约美国称霸世界的国家整体力量不断增强。但在我们称之为“多强”的国家中也呈现出不平衡发展态势。其中，只有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虽然中国近年放缓经济发展速度以提高发展质量，但提高质量恰恰是为新一轮经济强劲增长做出的准备。因此，中国有可能率先拉开与“多强”中其他国家差距，成为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多极化趋势也可能呈现出“美国单极—中美两极—世界多极”的发展过程。未来的五年，是由“美国单极”向“中美两极”加速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中，我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方面存在诸多给予与挑战。由于历史时期特殊性，在某些领域，中国面临的挑战甚至要多于机遇。

## 经济领域

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GDP总量已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且与世界第一的美国差距日益缩小。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为我国创造了良好条件，金融、贸易、产品全球化可为我国发展提供资金与市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国际上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日益缩短，我国应用世界先进技术的门槛相对降低。我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话语权不断增强，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份额增加，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正面临广阔全球经济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额不断上升，与东盟等周边区域性合作组织沟通对话机制不断完善，我国与周边经济合作也展现出广阔前景。

但中国经济发展依然存在很大国际阻力，发展速度越快，来自国际瓶颈的制约作用就越明显，这种制约作用，或是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一些负面影响。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带来了诸多宝贵机遇，总体说来利大于弊，但经济全球化的一些负面影响仍不可忽视。当前经济全球化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导，发达国家垄断大量资本与先进技术。经济全球化中国参与晚、发

展快，对资本与先进技术有迫切需求，这使得中国在一些领域不得不依赖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倡导市场开放，这无疑会给我国的一些弱势产业带来冲击。

第二，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由美国构建并主导，其目的在于维护与扩大美国经济利益。虽然中国话语权有所上升，但这一秩序下中国会极大受制于美国。随中国实力进一步上升，美国利用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对中国的遏制力度可能进一步扩大。而且，美国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依然存在。长期以来，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始终保持世界货币地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虽有所提高，但主要影响力仍局限于周边国家。我国过量持有的美国国债也为我国经济安全带来隐患。

第三，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随着我国经济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我国投资、产品在国外自由流动的潜在困难日益增大。许多西方国家以对本国产品进行高额补贴、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等措施限制中国产品进口，制造贸易摩擦，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中国国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挑战。

## 政治领域

当前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机遇与挑战同在。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际环境的整体和平为中国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联合国安理会在利比亚战争与叙利亚冲突中发挥的作用表明安理会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有所增强，这一趋势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提供良好条件。世界格局进一步演变，遏制美国称霸世界的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虽然其内部出现发展不平衡态势），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遏制有所加强。与此同时，我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得到巩固发展，与一些大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层次，众多领域互惠性不断增强，新型大国关系初具雏形。我国在朝核六方会谈、伊核问题中表现出积极负责态度，使我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得到更多国家信任。就周边而言，我国与周边国家的陆上领土争端得到一定程度解决，政治领域互信不断增强，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有所深化；与周边区域性政治组织的合作加强。这些都为我国未来五年发展提供良好机遇。

我们在看到国际政治环境积极因素的同时，也要看到消极因素。当前我国在国际政治中面临的挑战主要有：

第一，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并发挥不可小视的影响。近年来，美国实力虽相对衰弱，但美国仍常借涉台军售、会见“藏独”反动头子达赖喇嘛等问题屡屡干涉中国内政，中美间政治摩擦时有发生。美国自身衰弱越快，为显示其作为当前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就要

制造更多摩擦。随中国在国际格局中地位上升，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必将加大对中国遏制力度。在真正实现与美国地位对等前，中美政治摩擦甚至发生冲突可能性或呈不断上升趋势。

第二，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差异为借口攻击中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需要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历史与现实情况作出选择。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常不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现实，以偏激意识形态色彩看待“人权”等问题，指责中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进行国际反华活动。继东欧“橙色革命”、中东“茉莉花”革命后，西方国家再次妄图颠覆中国。随中国崛起步伐加快，不排除西方国家老调重弹，借此多次攻击中国的可能性。

第三，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并不稳定，周边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伊核问题、朝核问题等地缘政治问题仍无最终解决方案，印巴冲突等地区冲突此起彼伏，“三股势力”活动日益频繁。我国与印度等部分邻国存在陆上划界争端，《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签署后，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国土争端日益升级，甚至有演变为局部冲突的可能性；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议也常被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用作干涉东亚、东南亚、东北亚的借口。美国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大对亚太地区政治干预度，这一无端介入无疑加大中国周边地缘政治问题解决难度；美国还积极拉拢越南、蒙古、以及中亚国家，对中国在周边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威胁日益增大。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国家极端右倾化倾向明显，不断借钓鱼岛、修宪等问题对中国进行挑衅、制造冲突，严重威胁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为本已不安定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带来更多不安定因素。

第四，来自世界其他地区政治冲突的挑战。当前世界并不安定，巴以冲突、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等地区性冲突此起彼伏。随崛起进程加快，中国由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强国转变进程加速，其他地区政治冲突需要中国积极参与解决。由于各地区种族构成、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地区性政治冲突的解决有其自身复杂性。什么时候去解决、怎样去解决、达成什么结果，都是中国需要处理的每次都不一样的问题。解决得好，就可以化挑战为机遇，进一步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为中国创造良好国际政治环境。

## 安全领域

自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对国际安全领域认识不断深化。在传统国家安全与非传统国家安全两个领域，其研究都取得较大进展，出现一些成功实践，为我国维护国家安全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继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以来，基地组织多名头目相继毙命，国际恐怖主义遭受严重打击。以上合组织“和平使命”系列演习与索马里护航为代表，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的联合行动广泛开展。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各成员国安全互信不

断增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发挥作用日益突出，为维护中国周边安全创造条件。在能源安全领域，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达成陆上输油管道协议，一定程度提高能源安全程度。

安全领域涉及诸多方面，随着中国发展，中国国家利益不断外延，国家安全也早已超出传统意义上国土安全范围，延展到诸多地区和领域。当前正处于国际格局急剧变化时期，出于历史时期特殊性，中国国家安全情况异常复杂，充满潜在挑战。唯有处理好这些安全问题，才能巩固已有成果，加速中国崛起。中国未来五年在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安全挑战：经济全球化促进资本、技术、人才、信息自由流动，这一条件下更需谨防国际金融大鳄出于私利操纵国际货币金融市场带来的恶劣影响，如亚洲金融危机起因。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知识产权体制尚不完善，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机密与核心机密技术的保密带来新的挑战。未来五年内，中国开放程度将日益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程度增强，跨国公司大发展对中国企业带来冲击，西方资金、企业大量涌入对中国保持完整国家经济体系、避免西方国家操纵经济或部分操纵带来挑战。

第二，政治安全挑战：未来五年是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性大国、或超级大国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地位快速上升、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必将带来国际政治利益深刻调整。这一中国加速崛起过程中，出于国家利益冲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冲突或呈现日益频繁趋势，妄图颠覆中国政治体制、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活动可能不断增加，阴谋的实施手段也可能不断变化，对我国政治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第三，文化安全挑战：经济全球化带来全球文化交流，文化作为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不可避免地成为宣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工具。当前，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程度日益提高，国外敌对势力趁机以文化产品为载体，妄图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落后文化与腐朽文化输出到中国，西化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达到“和平演变”目的；不断涌入的国际文化也对中国文化造成了侵蚀。如何挫败国外敌对势力文化颠覆阴谋，捍卫中国文化安全，迎接国际文化挑战需要全面部署并采取切实行动。

第四，能源安全挑战：随我国经济发展，我国石油消耗量不断增大。未来五年内，随中国经济发展，石油消耗量并不会减少。我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长期以来原油进口依赖于波斯湾—马六甲—南海航线。出于地理位置特殊性，这条航线在战时极易被敌对势力封锁，在平时也极易受限，因此具有很大危险性。虽然我国已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陆上邻国签署石油管道建设协议，但石油进口依赖马六甲海路运输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加之与美国相比，我国战略石油储备极少，这给我国的能源安全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

第五，国土安全挑战：国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越南、菲律宾、日本等国家非法侵占我国领土并采取驻军等措施，对我国国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钓鱼岛作为中日交锋的重要阵地，军事敏感地带，其局势发展对于我国国土安全更是具有重要影响。加之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加大在亚太地区军力部署，利用在中国邻国的军事基地，已对中国形成东、南、西三面包围之势。随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国防力量增强，中国的国土安全在未来五年也面临严峻挑战。

第六，国外利益安全挑战：随中国发展，中国国家利益外延性增强，在外中国公民人数日益增多。利比亚撤侨等行动表明，如何在纷繁复杂环境下保护中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维护中国在海外的国家利益，是需要认真应对的新挑战。

\* 乔澍是外交学院本科二年级外交系的学生。他是外交学院知行学会的会长。

## 谈一谈模联

廉雅雯

今天要谈起模联，心中很是惶恐，甚至觉得自己有些放肆。因为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还未能以代表，或是组织者的身份参与到任何一次模拟联合国活动当中，充其量只能说是做了一回旁观者。但是还是想谈一谈，毕竟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去推开模联的大门，并且预备着迈入这个世界，预备着在这条路上，走得远一些。

初次听说模联，是在中学的时候。那时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一个展现英语实力的“比赛”，一般人根本没有资格也没有精力去参加；但是参加了这个“比赛”的同学，好像也没有比别人考得高一些，中考高考也不会有加分项，所以一般人根本没有兴趣去参加。总而言之，就是一个高冷到没朋友的“比赛”。那时作为一个“学霸”，作为一个在分数和考试面前越来越功利的人，我虽然羡慕那些用英语侃侃而谈的人，可是根本没有想过加入他们。

进入大学，凭着自己以为的自己的兴趣，我加入了辩论与演讲协会。辩论带给了我很多很多。我曾经为了一个定义、一种逻辑跟队友们争执不休，曾经为了一篇立论熬到凌晨，曾经在一个不足十人的小组里，做完了持续一个多月的八校联合辩论赛中的外联、会务的所有工作。我很享受每一次累到趴下的过程，很享受和小伙伴们一起打下一场比赛、办好一场比赛的过程；可是，我却并没有享受辩论。呵呵，这是怎样一种冷幽默。

在辩论中，我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把一个明明需要被全面看待的问题硬生生地分成两半，一方各执一词，你死我活；不明白为什么仅仅凭论证是否清楚、配合是否完美、风格是否优雅就要分出胜负，即便胜方所持观点完全是片面的；不明白究竟基于何种立场为一个自己根本无法认同的命题去证明。立场要有，但何至于双方之间的界限划分地如此锐利冷漠。辩论是一种伟大的活动，我很佩服在辩论场上叱咤风云的辩手们；但是他们享受着辩论，而我不能。所以我离开了辩协，离开了辩论。

但是总有基于一种立场、为了一种目标去表达自己的欲望；总有一种去合理地控制一种局面的欲望；总想有一群人可以在一起讨论一个问题，各有妥协，即便最后没有说服对方，没有达成一致，也各有收获；总觉得应该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放下孰胜孰负这种冷冰冰的判断标准，更加理性地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周围的人。

——我看到了模联。

在外交学院，没有人会不知道模联。我也意识到自己之前对于模联的认识有多可笑。它不是比赛，不是展现语言功力的秀场。每个人代表着一个国家或是政治实体，去表达立场、去争取利益，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绝对的壁垒。在今年的 BMUN 上，作为志愿者，看到了代表们演讲的样子，领导的样子，热烈讨论的样子，左右逢源的样子，紧锁眉头写着意向条的样子，己方决议草案被通过时欢呼雀跃的样子，我便觉得，该来试试模联了。

于是现在，我站在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面前，想起来，真的是不知不觉地走着走着，便走到了这里。并不过多关注能力会有怎样的提升，更多地希望能有更广阔视野，更从容的精神。

相信模联可以带给我这些。

\* 廉雅雯是外交学院大二国际法系的学生。她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的专员。

# 国际组织与中国国家能力建设

叶爽

**内容摘要** 国家能力一般是指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主要是指中央政府能力。在中国崛起背景下，国际组织和国家能力建设存在紧密联系：国际组织作为桥梁，既作为国家能力建设的结果，又扮演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动力之一。笔者继而提出国家能力角度上的中国与国际组织三层次的互动方式：中国的国家能力建设必须紧紧抓住建设国际组织中结构性权力的中心内涵，以国际组织等多边机制为首要平台，通过对国际组织等多边机制的参与、改造、新建来达成目标。

**关键词** 国家能力 国际组织 中国 多边平台

## 一、国家能力

国家能力这一概念的提出由来已久，一般是指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主要是指中央政府能力。不同学者对国家能力的界说有所区别。斯科克波尔认为，国家能力是一种政府有效地管理其领土范围内各种事物的能力。而普莱斯·史密斯认为，国家能力是一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繁荣稳定的能力，对其领土行使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控制、保护它的国民免受侵略并且能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纵便有不同表述方式的定义，但他们的观点中所包含的国家能力的内涵和外延却有着共通之处，即主要体现为四种主要的国家能力，如下所述。

一，社会汲取能力。即国家从社会中获得财政和人力支持的可能性。主要表现在财政来源。这是最重要的国家能力，也是实现其他国家能力的基础。中国当下可以扩展社会汲取的外在范围，从国际组织平台寻求更多的国家利益的获得。

二，社会资源配置能力。包括对财富、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物质方面的配置，也包括对地位、机会、知识、荣誉等非物质方面的东西，甚至包括政治权力本身的配置。主要表现在经济行为领域。举例来说，国家在不同社会集团间对稀缺资源进行权威性的调配，从而保障社会中所有人的经济安全，缩小社会不平等的再分配能力就属于资源配置能力的一个方面。比如，中国加入 WTO 以来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

三，社会调控能力。主要指对于社会的制度化规约能力和政治社会化能力。即国家的支配和控制能力。



说的更加具体一点，对外保卫政权和领土完整，对内维护社会秩序的强制能力、强化国家认同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培养的濡化能力、政府应该建立制度，使不同社会团体表达出来的各种政策偏好得以整合的整合能力都属于此类。尤其要说的是，对于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而言，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团体往往是这些多元利益的一大载体，这也因此是我们可以发展的方向。

四，社会发展能力。即国家具有的社会反映、社会适应、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等项能力。制止因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所可能给市场竞争和社会带来的危害的监管能力是社会发展能力的重要方面，中国在与主要国际组织的不断磨合之中，如何减少负面的、消极的影响已经成为一大重要议题。

虽然对国家能力的界说林林总总，但显而易见的是，以上学者的学说在阐释国家能力概念时，是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综合考虑的。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界定中国国家能力时，更应该统筹国内、国际两大方面进行考量。由此，笔者认为国家能力的命题是从国家的有效性出发的，而有效性又是针对国家与国际、国内社会的关系而言的。所以一个由此衍生的重要议题就是，何种途径能最好地实现国家与国际、国内社会这两者关系的融合。

此背景下，利用国际组织多边机制推进国家能力建设有其必然性。从根本上说，国家能力其实是国家政权对整个社会的强制力、干预力。然而，如果仅仅通过强制手段来维持国内的和平，其代价将是极其高昂的。由此，我们需要寻求其他的途径和平台来降低社会强制力实施的成本，国际组织的作用在此意义上又一次凸显。

基于上述，笔者提出，国际组织作为桥梁，既作为国家能力建设的结果，又扮演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动力之一。

## 二、国际组织

自1816年莱茵河航运中央委员会以降，国际组织在这两百年间已经得到巨大的发展，政府间组织、非政府间组织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广，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环境保护等诸多层次，可以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国际组织纵横其间的世界。

当今时代，国际组织的活动涉及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对当代国际政治的演变和发展影响之深刻已日益凸显。换言之，国际组织实体的兴起和发展正在对传统的国家主权产生某种影响，这种影响并非剧烈性的，而是渐进性的。这种影响有两个维度：一方面，昔日国家对

自身内外事务的、具有排他性的权力，开始程度不同地流失到许多国际组织手中，如联合国安理会。另一方面，在单个国家不能或不愿意涉足的领域中，国际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这里尤其要提到非政府组织），正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 三、国际组织和中国国家能力建设探究

如上所述，国际组织可作为联系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纽带，是中国国家能力提升的有效多边平台。中国应审时度势，充分利用好国际组织这一载体，实现中国国家能力的提升。

笔者认为，在现代国际社会中经济与政治以及难以分割的情境之下，利用国际组织这一产生结构性权力（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机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办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权力，是决定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框架的权力。）的平台之重要性尤为凸显，原因在于权力作为具有政治意涵的存在，将直接推动形成一国在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安排。因此，笔者提出：中国的国家能力建设必须紧紧抓住建设国际组织中结构性权力的中心内涵，以国际组织等多边机制为首要平台，通过对国际组织等多边机制的参与、改造、新建来达成目标。

研究当今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多元互动——参与、重建、新建时，应具有历史眼光，即将其纳入两者交流的历史演变脉络中去：建国至今中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从拒绝到承认，从观望到参与，从扮演一般性角色到力争重要发言权”的变化，且笔者提到的对国际组织的重建和新建，也应当符合这一脉络。

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挑战美国主导地位——这种地位亦昭然体现于在各类多边机制如国际组织中——的可能性将不可避免，此种挑战产生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其内在是對抗性的，所以将不可调和；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之中，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建设将对世界体系造成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同时这里需要提出，笔者在进行这部分的梳理时，摒弃了一般的按照国际组织类型进行的结构框架，而是更好地贴合、聚焦于“参与”、“改造”、“新建”这三个词本身，去选取不同领域的不同国际组织进行论述。

参与：

应该可以说，在过去几十年间，随着中国国家能力的提升、自身实力的极大增强，中国对世界主要国际组织的参与度有了明显的提高，从七一年重返联合国到世纪初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国际组织的席位中再也没有理由缺少中国。然而，有一些新建的或者特殊领域的国际

组织，中国仍然涉足较少，参与度不够。

中国申请加入北极理事会可以说是这一举动的良好范本。随着北极地区的能源和经济开发，包括中国在内的域外国家对北极地区的兴趣日益增长，各国都认识到北极地区的权势格式正在初步定形之中。直到 14 年 5 月，中国的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身份已满一年。对于中国这个在体制外的巨人来说，成为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也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北极事务当中，但是针对于北极理事会成员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中国需要结合自身实际，审慎谈判。在确保自身利益的同时，加深参与程度，在北极地区取得更多国家利益和获取国家利益的机会，更好服务于中国国家能力建设。

改造：

中国已经加入的国际组织中，不少面临着亟需改革的情境，这时候如果中国能够有所作为、承担改革的设计工作，将能直接在其中嵌入中国方面的利益诉求，进而推进中国的国家能力建设。例如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议题中，具体的方案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是一定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同时审慎设计好改革方案，避免“一步到位”而导致各方力量的不平衡和不满，影响我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和布局。

新建：

中国审时度势、以主动姿态对国际组织的新建，可视作打开外交新局面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我国外交布局中从“韬光养晦”走向“有所作为”甚至是“主动出击”的一大表现。笔者在这里谈及的新建意味着对于当前国际格局之中已有的、但已经不能实现其自身效能且也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诉求的国际组织的替换，以及对当前国际组织发展状况下涉及不多、不完善、不完整、不成规模的议题领域的大胆探索和建设。笔者将结合中国国家能力建设的各个侧面，给出对上述两种方向的考察。

要厘清的是，由于国家能力建设的“内向性”（即其建设的重点和目的是加强国家对内的控制力、掌控力）因此需要将着眼点落在国家对内、对外利益的综合点和交叉处，考察关于内外影响交叉的国际事务领域。出于这点考虑，笔者选取国际恐怖主义安全等议题作为中国对国际组织新建的可能方向。

过去，国际军控领域，尤其是核裁军领域，由于美俄的绝对优势和绝对话语权，并没有显现出多少对于中国进行国际组织建设的多少优势。但是对于核恐怖主义的防治，中国应当采取更加积极甚至是不能有任何推让的态度，其原因昭然可见：自世纪初美国 9·11 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流向的趋势愈加明显，一些国家如美国的恐怖主义威胁变化不大，一些国家如日本的恐怖主义威胁较前反而减少，但另一些国家如中国、印度的恐怖主义威胁的深刻性凸

显。

而且，由于中国人员密集、经济点集中的特殊情境，防止任何恐怖主义活动发生的成为建设国家控制能力的重要议题。

另外考虑到成本问题，中国不能按照实力政治的模式谋求核力量的均势，而要采取对话方式，建立和完善更加有效的多边国际组织来寻求和平，依靠国际制度和国际舆论的压力推动事态向着积极方向转变，以减少中国解决此类问题的成本。

同时由于此类核恐怖主义问题的外延具有跨国境的显著特点，例如讲，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曾经表示对我国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政策的反对，这已经存在了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对于中国的国家控制能力，是个巨大的挑战。加之国际安全领域尚无成熟的、行之有效的国际组织和机制，故中国在此领域主动出击是大势所趋。

#### 四、结语—从国家能力视角看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多层次互动

就现状而言，国际组织是主权国家谈判的场所；就前景而言，国际组织的愈渐发展正在和某种权力发生联系，这种权力从议程的设置中产生。这种通过第三方设置议程而产生权力的现象由来已久，现代中国在转型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通过国际组织之平台更好地服务于国家能力建设这一目标。

国家能力和国家利益其实是共生的，国际组织等多边场合是实现国家利益的绝好平台。就上文而言，笔者在试图寻找国际组织这一实体和中国国家能力这一掌控力的关系，其目的相当明确，即为国家的长远发展作谋划；然而事实上这一过程和中国寻求国际地位提升、改变自身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参考文献：

1. Skocpol Theda.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A]//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C].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 Price-Smith, Andrew T. The Health of Nations[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1.
3. 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 叶爽是外交学院大二外交系的学生。他是外交学院模拟联合国协会的专员。



Vol.06, 2014.09  
CFAUMUNA Presents